

中国

ZHONGGUO

YANYU

DAQU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海版

谚语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汉语俗语语料的

计算机处理与

相关语言学问题研究”

(02BYY017)

最新成果之一

上

大全



主编 温端政 上海辞书出版社语文辞书编纂中心

中国

ZHONGGUO

YANYU

DAQU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海版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汉语俗语语料的
计算机处理与
相关语言学问题研究”
(02BYY017)

最新成果之一

谚语

上

大全



主编 温端政 上海辞书出版社语文辞书编纂中心

“中国俗语大全”编委会

主 任 侯伍杰

副主任 张成德 李伟国

委 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宦荣卿 沈慧云 温端政 吴建生

杨蓉蓉 张铁声 张晓瑜 周伟良

《中国谚语大全》

主 编 温端政

上海辞书出版社语文辞书编纂中心

副 主 编 范瑞婷

编写人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姓名后加 * 号的为主要编写人员)

曹瑞芳 陈 予 范瑞婷 傅朝阳 韩身智* 李小平
李秀荣 柳长江* 马 敏 马启红 王海静* 王文亮
温朔彬 巫建英 吴建生 徐宏伟 杨建红 扈春风
张梅梅* 周文芳

资料人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编写人员参加资料工作的未列)

范金宝 李 琳 苏宝英 王逢亮 邢 甜 杨 雪
周惠琴

审 订 沈慧云

责任编辑 周伟良 宦荣卿 刘 凌 杨蓉蓉 陈 崎 沈毅骅
吴东昆

封面设计 姜 明

主要校对 姚明耿 杨桂珍 钱瑶华 蔡亚宜 郑浩珺 沈丽霞
杨忠煌

索引编制 张国强 沈若英

序

江蓝生

最近十几年,出现了许多种俗语的汇编集,选编者不同,篇幅规模不等,但下功夫最深、规模最大的要数温端政先生主编的《中国谚语大全》、《中国歇后语大全》、《中国惯用语大全》。这三部书合成“中国俗语大全”,共计500多万字,堪称鸿篇巨制。编者从古代经、史、子、集,近代戏剧、小说,现代名家名作中广泛搜集各类俗语,不惜功夫,务求穷尽,是以敢谓之“大全”。当然,所谓“大全”也只是相对而言,观天下书未遍,难言“全”,何况,还有一些俗语在人们口头流传而未曾编入书籍中呢。这三部书在编写体例上颇动了一番脑子,语目次序编排合理,有的条目附有简明的注释说明(包括注音),体现出为读者着想的编写思想。书中引书规范,体例格式细密,从中可看出编写者的研究素养。

不特如此,据了解,编写者们还在这三本书的基础上扩大资料搜集范围,将资料输入计算机,创建了一个“汉语俗语语料数据库”,把特定主题或目的的数据跟服务对象连接起来。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实现资源共享,而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各种用户的需要。将现代化的研究手段用于传统文化资源的研究中去,这是汉语俗语研究方法的新突破,必将推动汉语俗语研究的新进展。

俗语是历代群众创造的口头语汇,它题材广泛,思想活泼,风格幽默,形式凝练,是亿万人民群众世代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历代流传下来的俗语为现代汉语提供了无比丰富、生动的语言材料,现代人尤其是戏曲小说家们无不从中汲取养分,用以滋润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俗语材料中包含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丰富信息已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但着手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并不多,这三部《大全》的出版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完备的资料基础。干什么的吆喝什么,下面

仅从语言学的角度,就研究俗语资料的方法和价值谈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 借助汉语史研究的成果考释难解俗语

我是搞汉语历史语法和词汇研究的,我发现历代汉语俗语也能为历史语法和词汇的研究提供有用的资料;反过来,汉语历史语法和词汇的研究成果,又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一些俗语的含义或产生的历史时代与代表的方言区域等。仅举三例说明。

(1) “爱他的,着他的”(《中国谚语大全》)

这句谚语的确切含义人多不解,编者引了一条书证:

他和你可曾说来历,你明知是鬼,怕他来缠你。常言道:“爱他的,着他的。”(元·郑廷玉《后庭花》四折)

仅凭此书证仍难以确解。其实,如果熟悉元明戏曲小说语言就很好理解。“着他的”“着”是“中计”的“中”义,“爱他的,着他的”意思是“贪爱别人的(东西),就容易上别人的当”。这个意思的“着”常跟“道儿、圈套、假”等名词搭配使用,“着(他)道儿、着圈套、着(他)假”都是上当受骗的意思。例如:

那厮说出来,必然做出来。我如今不先下手,倒着他道儿。(《后庭花》二折)

虽是不风骚,不到得着圈套。(元·无名氏《新水令》套;“不到得”,不至于)

观其形容动静都像,只是言语不像,只怕着了他假。(《西游记》四十二回)

(2) “按定坐盘星 坐盘星:也叫定盘星,戥子或秤杆上标志起算点的星儿。指打定主意。”(《中国惯用语大全》):

“按定坐盘星”就是“按着坐盘星”。“定”用在动词后面,可以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实现或持续,相当于“了、着”等,古今文献中多见,南北通用。相当于持续态助词“着”的用例如:

堵定个门儿放着火。(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第二)

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元·睢景臣《高祖还乡》)

马汉同定那人,来至山中,走上大厅,见两旁柱上绑定二人。(清·石玉崑《三侠五义》第六回)

连鲁迅的作品里也沿用,《野草·死后》:“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说:‘你

莫非真正糊涂了?’”

(3) “眼泪留着些脚后跟”(《中国惯用语大全》)

此句惯用语的意思是“眼泪流到脚后跟”，极其夸张地形容眼泪之多。其中“着”和“些”是妨碍理解的障碍词。根据汉语语法史和词汇史的研究，“着”为介词，用在动词后面，引出动作所在的处所或所达到的处所，相当于“在”或“到”，字本作“著”。在这句俗语里，“着”相当于介词“到”。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的文献里这类用法的“著/着”都时或可见。相当于“在”的例子如：

长文尚小，载著车中……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世说新语·德行》)

埋著地中。(《李陵变文》)

相当于“到”的例子如：

负米一斛，送著寺中。(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

说着来由愁煞人。(敦煌本《捉季布传文》)

读书须是看著他那缝罅处。(《朱子语类辑略》)

元明以后，由于“著/着”的轻声化，文献中多改用“的”字：

跳冬瓜，跳西瓜，跳的河里仰不搽。(《朴通事谚解》)

只见赵宣子齐整穿了朝服要出朝去，看天色尚早，端坐的堂上。(《皇明昭令·武士训诫录》)

到是我叫他抱的房里去，恐怕晚了。(《金瓶梅词话》)

再来看“些”。“些”本为量词，“些、一些、些个”用在名词前面表示量(少量或多量)，由于用法的固定化、格式化，有时不表示量时也出现在名词前，这时“些”义虚化，用如助词。“眼泪留着些脚后跟”的意思就是“眼泪流到脚后跟”，“些”在这里虚化为助词。山西万荣方言里“些”可以作语气助词，虽然具体用法与此不同，但由量词用作助词却是相同的。

(二) 利用方言研究的成果进行研究

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大都带有方言色彩，有的只通行于一定的方言区域，因此理解这些俗语，研究这些俗语，理应与方言研究相结合，吸取方言研究的成果。例如：

阿大穿新，阿二穿旧，阿三穿补，阿四穿破

阿大着新，阿二着旧，阿三着破，阿四着筋 筋：肌肉，指衣裳破得露出肌肉。

这两句谚语意思相同，只是动词有异，一个用“穿”，一个用“着”。俗语中

同义词的替代反映了地域与时间的因素,很值得注意。据学者研究,自东汉开始穿衣服鞋袜普遍用“著”字(上古多用“服”字),到了宋代“穿”字才逐渐通行起来,但直到今天一些存古成分较多的方言如吴语、粤语仍用“着”。另外,兄弟排行北方说“老大、老二”,不说“阿大、阿二”,排行用前缀“阿”是吴语、粤语等南方话的用法。上海话里有“筋肉痂子”一词,指鸡皮疙瘩,由此可知以“筋”指皮肉是上海话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判断这两句同义谚语本出自南方方言区,而且用“着”的一句很可能出自吴语区,用“穿”的一句应出自其他地区的人的仿改,时间要晚于“着”字句。

(三) 运用训诂学 and 现代语义学的方法研究词义的演变

有些俗语的意思跟字面义不同,是研究词义引申规律的上好素材。例如:

《中国谚语大全》:“阿爷值钿大孙子,阿爹值钿小儿子值钿:方言,疼爱。”“值钿”义为“值钱”,吴方言区管“钱”叫“钿”。由“值钱”义引申为“疼爱”,反映了语义演变中的隐喻与转喻现象。值钱的东西贵重,由贵重到看重是转喻,由看重到疼爱是隐喻。

(四) 利用三部《大全》补充大型辞书收词或义项之遗漏

有些词语的义项在一般文献中没有书证,但却有可能保留在某些俗语中。《谚语大全》“爱便宜,错便宜”一语的意思应是越爱便宜的人反而越得不到便宜。“错”由“错过”引申为“失去”。但各种汉语辞书中“错”字下均未收“失去”义。《汉语大词典》“错”字下有“夭亡”义,例证为周立波《山乡巨变》上九:“第二胎又是个女的……带了一个月还是错了。”原注:“夭亡的代语。”其实,“错”的“夭亡”义源自其“失去”义,即“错”由“错过”引申为“失去”,再由“失去”特指“夭亡”。汉语辞书应据此条谚语补收“失去”一义。

有的俗语中词义保留古义,辞书漏收,可以从古代或近代文献中索解。例如谚语“八月初一雁门开,懒妇催将刀尺裁”的意思是:秋天到了,懒妇赶快做冬衣吧。本是催促懒妇做冬衣的,但是从字面上看,倒是懒妇催人做衣物。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里的“催”不作动词“催促”解,而是副词“赶快”的意思。这个意思的“催”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里就已看到。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七:“有三人入山,见山顶有果树,众果毕植,行列整齐,如人行。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饱,乃怀二枚,欲出示人。

闻空中语云：‘催放双柑，乃听汝去。’”(赶快放下两个柑子，才让你们离去)再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礼异》：“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夫家领百余人或十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夫家迎亲喊“新娘子，快出来”，这是唐人记北朝风俗，也说明彼时“催”作副词“快”讲。“催”的这一用法唐代文献中已难见到，这条谚语产生的时代可能颇早。查《汉语大词典》未收此义，应当补上。

上面简要介绍了历代俗语对于语言研究的宝贵价值，也举例式地谈到研究古代俗语的方法和途径，不过是一己之见，未必有当，仅供爱好者参考。历代俗语为研究方言、历史语言、民俗文化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还是一块未被开掘的处女地，我们期望这三部书的出版及其语料库的建立，能够推动各有关领域研究的开展和深入。主编温端政同志是我的学长，在推动方言研究尤其是山西方言研究方面做出过突出的贡献，语言学界尽人皆知。现在他壮心不已，在收集整理以往俗语资料的基础上主编了这三部俗语大全，并创建俗语语料库，对于他丰硕的研究成果，对于他知难而进的学术开拓精神，我深为敬佩。三部巨著即将出版问世，端政学长嘱我写序，我难以辞免，仅缀数语，权为序。

2003年12月1日于北京听雨斋

前 言

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合称俗语。

俗语作为一种具有民间风格、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早在先秦文献里就有许多记载。不过当时常单称作“语”，如：

语曰：“流言止于智者。”（《荀子·大略》）

语曰：“莫知其子之恶。”（《尸子》卷上）

语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列子·杨朱》）

古语曰：“不知，无害于君子；知之，无损于小人。”（《尹文子·大道上》）

“语”前面可以加上“野”或“鄙”，表明具有民间性。如：

野语有之曰：“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士尚志，圣人贵精。”（《庄子·刻意》）

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战国策·楚策四》）

“语”有时也称作“谚”。如：“唇亡则齿寒”在《穀梁传·僖公二年》里被称作“语”，在《左传·僖公五年》里被称作“谚”；古语“莫众而迷”，也作“莫三人而迷”，在《韩非子·内储说上》，一处称作“语”，一处称作“鄙谚”。东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语，谚言也。”

这些事实表明，先秦时代所称的“语”、“谚”，以及“野语”、“鄙语”、“鄙谚”等，大致相当于后世所称的“俗语”。

“俗语”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和刘向的《说苑》：

《史记·滑稽列传》：“民人俗语曰‘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

《说苑·贵德》：“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无极，偷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云：‘画地作狱，议不可入；刻木为吏，期不可对。’”

比较而言，《史记·滑稽列传》里的“俗语”，属于一般词语，意思是民间流传的说法；而《说苑·贵德》里的“俗语”则具有术语的性质，用来指称民间流行的定型语句，大体相当于先秦时代的“语”或“谚”。

俗语是与“雅言”或“雅语”相对的，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被视为村言野语，一般不能登大雅之堂。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大量俗语被许多经典著作所引用，这说明它不仅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特殊的表现力和生命力。这种情况引起某些文人士的关注，于是开始出现收集、考释俗语的典籍。

最早的可能是东汉服虔的《通俗文》和崔寔的《农家谚》。唐宋时期，由于市井文学地位的提高，俗语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进一步受到重视。出现了以李义山的《杂纂》为代表主要收录歇后语的著作，包括宋王君玉的《杂纂》和苏子瞻的《杂纂二续》等。宋代除了“杂纂”系列之外，还出现了无名氏的《释常谈》和龚颐正的《续释常谈》等“释常谈”系列。宋代还有周守忠的《古今谚》一卷，采摘古今俗语。明代则有杨慎辑录的《古今谚》，以及陈士元的《俚语解》、无名氏的《目前集》等。清代随着训诂学的兴起，俗语的收集和考源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批具有辞书性质的俗语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陈鱣的《恒言广证》、郑志鸿的《常语寻源》，以及杜文澜的《古谣谚》等。特别是《古谣谚》，“引书达八百六十种，辑得先秦至明代的谣谚三千三百余首，而且逐首引述本事，注明出处，遇有疑难还能加以考辨，因而直到今天仍不失为同类著述中的佼佼者”。（中华书局1983年“重印说明”）

20世纪以来，俗语的收集、整理工作进入新的阶段。20年代问世的《俗语典》（胡朴安等编著）和《通俗常言疏证》（孙锦标编著）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更是掀起了新的高潮。一方面收集、整理俗语语料的工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另一方面，各种类型的大中小型俗语类辞书不断问世，形成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在收集、整理谚语资料方面，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签发了《关于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省、地（市）、县各级

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组织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及基层文化单位进行全面普查与采录。经层层汇总选编,从1990年开始,《中国谚语集成》凡31卷,除台湾卷暂缺外,陆续问世。收集到的谚语资料,大大超过前人,仅山西卷,就从征集到的15万条谚语资料中,精选出2万余条。(《中国谚语集成·山西卷·后记》)

与此同时,歇后语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也受到各方面关注。198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歇后语大全》(李兴望、闵彦文编),收条达1.2万,在当时看来相当可观。1987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歇后语大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资料室、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收条达6万多,洋洋大观,在新的层面上反映了汉语歇后语的丰富性,其资料之完备达到此前同类著作无可与之匹敌的程度。此后相继问世的《中国歇后语库》(黄晟军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中国民间歇后语集萃》(阎乾福主编,学苑出版社,1997)、《中华歇后语大观》(袁晖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等,收条数也都以万计。

在惯用语方面,周培兴主编的《汉语惯用语新解》(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5)收条超过1万;高歌东、张志清穷20年心血编著而成的《汉语惯用语大词典》(天津教育出版社,1995)收条达1.4万。此后问世的郑勋烈、郑路编著的《中国惯用语》(东方出版中心,2002),收条也有1.3万。

此外,还有许多综合性的语汇类辞书。如武占坤、马国凡主编的《汉语熟语大词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收条达1.6万(不计变体,包括成语、格言);徐宗才、应俊玲编著的《俗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4),收俗语1.3万条;何承伟总策划的《语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收条上实现了新的突破,超过10万条,其中大部分是俗语;翟建波编著的《中国古代小说俗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虽然收条范围受到限制,也有2万条左右。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辈和时贤的著作发掘了汉语俗语语汇的丰富资源,编写了一批弥足珍贵的著作,包括上面提到的和限于篇幅没有提到的(见附录)。“中国俗语大全”继承了他们的优良传统,借鉴了他们的成功经验。在资料上,除了我们自身多年的积累外,还广纳博采,力求完备,争取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在这里,我们除了对前辈和时贤在俗语领域的辛勤开垦表示敬意之外,还要为我们从中受益而向他们表示感谢!

二

“中国俗语大全”主要是罗列事实。罗列哪些事实,如何罗列,需要理论指导。这里涉及什么是“语”,什么是“俗语”;“语”和非“语”,“俗语”和非“俗语”的界限如何划定;“俗语”如何分类,各类的区别性特征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我们过去作过一些探讨,在这里主要就编纂“中国俗语大全”过程中遇到的与俗语的性质和范围,以及分类等相关的问题,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

要明确俗语的性质和范围,必须先明确什么是“语”。这个问题,就感性认识而言,似乎很简单,但如果要提高到理性认识,给“语”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并不容易。试看几种有影响的辞书,对于作为语言单位的“语”的解释:

《辞海》(1999年版):成语、谚语或古书中的话。

《辞源》(1988年版):谚语,成语。

《汉语大词典》:俗语、谚语或古书中的话。

《汉语大字典》:说的话……特指谚语、古语或成语。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谚语;成语。

以上五种辞书对“语”的解释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各有可取之处,但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对“语”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阶段。要给“语”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必须把对“语”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有鉴于此,我们曾经给“语”下过这样的定义:语是大于词的、结构相对固定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叙述性语言单位。(见温端政、沈慧云《“龙虫并雕”和“语”的研究》,《语文研究》2000年第4期)这个定义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我们对“语”的性质和范围的认识。

第一,“语”是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单词不成语。

第二,“语”具有相对固定的结构,自由词组不属于语。

第三,“语”具有多种功能,除了能像词一样,充当句子成分,作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外,还可以充当复句的组成部分,相当于一个分句;或单独成句,充当句群的组成部分。“语”还常常被作为“现成话”被引用。有的进入句子之后,还可以被拆开使用。

第四,“语”的内容具有叙述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不仅使语与复

合词区别开来,而且使语与同为“固定词组”的专有名词(或称专名词)和各行各业的专门用语(如:计算机病毒、非典型性肺炎、能量守恒定律)区别开来。复合词(主要是复合实词)、专有名词和专门用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概念性,而不具有叙述性。

第五,“语”是语言单位。这一点也很重要。它不仅使语与一般常用短句(如:下雨了;刮风了)区别开来,而且使语与来自名家名篇的格言区别开来。格言属于言语单位,而不是语言单位。

以上五个方面,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是“语”的定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同“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为所谓语言的词汇”(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1页)一样,语言中所有的语构成语言的“语汇”。词汇是一个系统,语汇也是一个系统。

语汇作为一个系统,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雅俗之分。俗语除了具有语的共同性质外,还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为人民群众所创造,具有群众性。许多俗语历代相传,广为流行,成为民族共同语语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的俗语,具有地域性,流行的地区不很广,但为当地群众所喜闻乐见,仍然具有群众性。

二是流传在群众的口头上,具有鲜明的口语性和通俗性。俗语是通过群众口耳相传而流行开的,所以口语性很强,总离不开一个“俗”字。不过,对于语体风格,要有历史观点。有些古代俗语,像“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见《史记·李将军列传》)、“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见《汉书·王嘉传》),以及“心则不竞,何惮于病”(见《左传·僖公七年》)等,现在看来似乎不“俗”,甚至有些古奥,这是汉语的历史演变所形成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把俗语定义为:汉语语汇里为群众所创造,并在群众口语中流传,具有口语性和通俗性的语言单位。

按照这种定义,俗语首先应包括谚语。除了谚语之外,俗语还应该包括歇后语和惯用语。它们同样具有俗语的性质。

与俗语相对的,是“雅言”或“雅语”。

在语汇系统中,称得上是“雅言”或“雅语”的有成语中的“雅成语”。“雅成语”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来源于书面系统,多数来自古代的经典性著作,如“暴虎冯河”来

自《诗经·小雅·小旻》,“背城一战”来自《左传·哀公十一年》,“呆若木鸡”来自《庄子·达生》。还有来自古代神话传说或寓言故事的,如“夸父逐日”、“黄粱美梦”、“愚公移山”、“自相矛盾”等;还有来自古代历史事件或名篇名句的,如“退避三舍”、“草木皆兵”、“水落石出”、“鞠躬尽瘁”等。

二、多文言成分,包括文言实词和文言虚词,如“管窥蠡测”、“文恬武嬉”、“一丘之貉”、“不胫而走”等。

三、通行范围上,多为文人所使用。

与“雅成语”相对的是“俗成语”。俗成语来源于口语系统,有的来自古代口语系统,有的来自近代或现代口语系统;组成要素多白话成分,多通行在群众的口语中。从性质上看,俗成语应当属于俗语。但是,俗成语和雅成语有相当一部分很难划分,再加上结构上相同,一般成语类辞书都二者兼收。因此,俗语类辞书一般不再收俗成语,“中国俗语大全”也是这样处理的。

俗语既然包括谚语、歇后语和惯用语,就存在三者的定性和相互之间界限的划分问题。这个问题,学术界有过许多讨论,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我们认为,只要抓住语的“叙述性”特征,这个问题便不难解决。

如前所述,叙述性是语的内容(语义)的共同特征,即使是“融合性”最强的语也不例外。语的叙述性,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表述性。表达某种推理或判断,传授某种知识(含经验)。如“众人是圣人”、“远水不救近火”、“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

二是引述性。前一部分是“引子”,从中引出后一部分“注释”;后一部分“注释”表示某种形象、性质或状态。如“木匠的斧子——一面砍”、“快刀打豆腐——两面光”、“夹肢窝生疮——阴毒”、“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等。

三是描述性。描述事物的形象、性质或状态。如“走后门”、“喝西北风”、“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挂羊头,卖狗肉”等。

第一类即谚语,属于表述性俗语;第二类即歇后语,属于引述性俗语;第三类即惯用语,属于描述性俗语。事实表明,这种分类办法,有以下两个优点:

一是标准明确,界限清楚,具有可操作性。引述语由具有“引注”关系

的两个部分组成,在形式上有着区别于谚语和惯用语的特征。表述语和描述语虽然在形式上有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在内容上,有表述性和描述性之别,有的一看就能作出判断,有的只要细心体察,也不难辨别。

二是分别用谚语、歇后语、惯用语等传统名称来称呼表述性俗语、引述性俗语和描述性俗语,既给传统名称赋予科学内涵,又使分类结果符合传统习惯和大多数人的语感,具有可接受性。

当然,语言本身是复杂的,有的可以有两种理解,交叉的情况不能完全避免,不过这种情况只是少数,而且还有规律可寻。

三

谚语、歇后语和惯用语,作为俗语的组成部分,共同的特点自然就是“俗”。然而,俗和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不仅在语言形式上是如此,在思想内容上也是如此。事实表明,俗语并不是一俗到底,而是俗中有雅,或者俗中出雅。因此,俗语不仅在语言形式上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可以做到雅俗共赏。试以《战国策》所引的“鄙语”为例:

庄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庄辛对曰:“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楚策四)

臣闻鄙语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异于牛后乎?(韩策一)

《战国策·赵策一》还引有“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一语。《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用时冠以“野谚”:

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这些谚语都含有深刻的哲理,古今传诵不衰。表明“鄙语”不鄙,“野谚”不野。

歇后语和惯用语,也有许多可称为“珍品”的。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歇后语,语出《史记·淮阴侯列传》)、“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歇后语,语出《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惯用语,语出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赔了夫人又折兵”(惯用语,语出《三国演义》第五十五回)。

即使那些取材“俗气”较浓的俗语,如“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谚语)、“尿泡虽大无斤两,秤砣虽小压千斤”(谚语)、“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歇后语)、“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歇后语)、“占着茅坑不拉屎”(惯用语)、“挂羊头,卖狗肉”(惯用语)等,也是俗不伤雅。

大量事实证明,雅俗共赏是俗语的主流。

但是,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相当复杂的。我们既要肯定俗语的主流是积极和健康的,同时也要看到俗语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除了来自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外,还有时代的局限性。我国历史上长期是封建社会,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劳动人民的思想,必然受到统治阶级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劳动人民自己创造或者传诵的俗语,也会存在背离本阶级利益的消极成分。拿谚语来说,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等,宣扬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和封建主义的忠烈观;像“人算不如天算”、“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等,宣扬了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钱能使鬼推磨”等,宣扬了极端的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等等。这些都明显地打上了旧社会、旧思想的烙印。歇后语和惯用语,也有一些内容不健康乃至庸俗的消极成分。

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俗语,特别是谚语是否具有阶级性的问题。

认为谚语具有阶级性的观点,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曾经盛极一时。“对谚语要进行阶级分析”,“谚语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成为当时的主流观点。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一些论著开始强调谚语的民族性,谚语具有阶级性的观点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但这种观点,至今仍然没有消除。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是把谚语和格言混为一谈,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谚语和格言的创造者与使用者毫无例外地隶属于一定的社会行业、一定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不同社会阶级和阶层的人们创造出的谚语和格言,自然反映着本阶级、阶层人群的认识,代表他们的观点和意志”。

这里涉及谚语和格言的区别问题。前面已经说过,谚语和格言性质不同,谚语是语言单位,而格言是言语单位。格言一般来自名家名篇,有